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0期(民國109年12月),157-16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寧,《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486 頁。

毛升*

《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的作者張寧,曾負笈英倫,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據張寧自陳,劍橋代表英國的菁英文化,又是一所男性爲主的學校,作爲一位來自台灣的女留學生,感覺自己既處在英國主流文化的邊緣,又處於中西文化的夾縫之間。張寧的邊緣感和中間性（in-betweenness）,任何有過留學經歷的人,都會心有戚戚焉。她因此也產生了對處於不同文化之間事物的興趣和同情,並將其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大英帝國曾自詡「日不落帝國」,擁有的殖民地數量爲列強之冠。二戰後,大英帝國迅速衰弱、直至瓦解,但帝國歷史的影響並沒有消失。正如英國歷史學家畢可思（Robert Bickers）所言:「帝國與我們同在,在我們醒著的生活中,也在我們的好夢和噩夢裡。二十一世紀初期的英國社會、政治以及文化,都深刻地受到了帝國經歷的影響。」[1]帝國的歷史不僅影響作爲帝國中心（metropole）的英國社會,對殖民地與次殖民地這些帝國邊陲（periphery）,也仍然產生影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往往愛恨交加（love and hate complex）,難以截然脫鉤。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爲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因爲不同群體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評價不同,至今仍爲究竟該稱日本殖民時期爲「日治」時代

*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1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p. 1.

還是「日據」時代而爭議不休。回到臺灣後，張寧見到周圍有很多與西方或日本「看似相似，實則有異」的事物，差異雖細微，卻很難解釋清楚。因此，她希望透過細緻的個案研究來分析這種差異產生的過程。本書即爲她深耕十多年之作。

本書探討西方文化進入近代中國後發生移轉的過程。作者選擇中西文化交匯的通商口岸上海，考察大英帝國與近代中國兩種文化間的交流，跑馬、跑狗和回力球三項運動則是該書的檢測對象。該書分爲六章，前三章以跑馬爲例，考察運動與殖民之間的糾葛，後三章從運動參與者以及觀看者的角度，探討運動與娛樂之間的關係。

第一章考察賽馬文化從大英帝國中心傳播至上海通商口岸的過程。當賽馬運動進入中國時，該運動在英國也正逢劇烈變動，因此賽馬在母國和上海同時都在不斷演變中，但方向迥異。在英國，賽馬是一項鄉村活動，賽事具有地區性和社區性。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由於鐵路網的建立以及工人收入的增加，爲吸引工人參賽和下注，賽馬逐步朝商業化和大眾化的方向發展。賽馬剛進入上海時，還保留母國地方性賽事的特色。在租界，幾個主要洋行扮演地方仕紳角色，籌組賽馬委員會，規劃賽事，並成立了上海跑馬總會。英國賽馬場成立總會、實行會員制的目的，主要在於區隔仕紳與工人兩種階層的觀眾，而上海的跑馬總會因處於租界，不少總會董事身兼工部局董事，權傾一時，使跑馬總會也成爲租界權力架構的一部分，與工部局處於平等地位。上海的賽馬活動與紳士型總會結合成一項菁英運動，也成爲在殖民社會中身分形塑的工具，不只排除工人階層，亦排除租界的華人菁英。華人菁英在多次要求加入跑馬總會受挫後，轉而試圖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英式總會，由是賽馬便開始了從西人主導改爲由華人主導的移轉過程。

華人社會與賽馬的關係是第二章討論的議題。西人賽馬會是一個殖民者內部的俱樂部，既不能也不願意接受華人。二十世紀初，上海著名商人葉成忠之子葉子衡決定另組華人的馬會，並得到多位紳商的支持；耗時四年，花費無數

後，終於成立「萬國體育會」。該會成爲上海華商的運動型總會，由華人擔任騎師與馬主，可以與西人同台競技。之後，西人一直擔心華人不能掌握如公平競爭、伙伴情誼、誠實等英式「體育家精神」，也擔心萬國體育會挑戰上海跑馬總會的權威。1920 年葉子衡因財務危機，不得不釋出該會一半股權，上海跑馬會伺機購入，從此兩個賽馬會成爲伙伴，實現了華洋合作。華商藉萬國體育會這一平台，終於打入殖民社會高層，提高了自身在這個華洋共治環境中的位階，同時也賦予了賽馬運動部分中國文化特色。

第三章討論進入民國後，新興的中間階層如何建立一個純華人的賽馬會。萬國體育會畢竟是一個華洋共治的賽馬組織，對華人的加入資格仍有限制。隨著中產華人增多，他們希望能有一個階層限制更寬鬆的華人賽馬會，過一把馬主癮。因爲參與賽馬的人口日益增多，賭金收入日甚一日，商人和幫會人士遂共同合作，於 1923 年底開始購地，建立新的跑馬場。1926 年，他們組織了「上海中國賽馬會」，對外以挽回利權、純粹華商爲號召；對內則尋求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青幫三大亨的支持。1931 年，杜月笙和張嘯林以賑濟 16 省水災爲名，發起了規模空前的百萬香賓大賽，將賭博與慈善結合，成功地將中國賽馬會的聲譽推向頂峰。從此，中國賽馬會中不僅有菁英，青幫名流及其手下的小八股黨亦先後加入，或出任馬主，或成爲董事。至此，賽馬會不僅實現了華化，獲得與西人馬主平等的機會，也徹底打破了英式賽馬中最重要的階級區隔。

以上三章從組織者的角度，呈現了上海通商口岸的賽馬會從英國人主導，排除華人，到最終華化的過程。接續三章則是從參與者、觀眾的角度，考察華人參與方式的變化，以展現賽馬、賽狗、回力球賽中娛樂和賭博之間的張力。

在通商口岸，賽馬自始就是華人熱衷的一項娛樂。第四章描述華人如何從場外觀看的觀眾，轉爲入內買馬票、參與賭馬的過程。賽馬頗有觀賞性，每逢賽季來臨，數萬華人不憚辛勞前往觀看。但他們只能在場外遠觀，也只是看熱鬧：看馬匹、看騎師、看比賽結果，更爲看盛裝到場的淑女以及青樓名妓，而女人也將此作爲展示自身魅力的舞台。儘管身處場外，觀眾並非只是被動的看

客，而是積極地參與通商口岸文化的創造。隨著上海人口與城區的大幅擴張，中產階級興起，尤其是萬國體育會成立後，賽馬逐漸大眾化。1920 年前，萬國賽馬會和上海跑馬總會已變成城市居民可自由參與的公眾娛樂。只要買票，即可入場下注，參與賭馬。之後，賭博成爲滬上賽馬的重要成分，華人迅速學會了此種新式賭博，尤其大小「香賓票」等賭馬彩票的發行，無需入場，亦可下注。因此，華人參與賽馬的方式從觀看變成了賭馬，參與者的階層也持續下降，直到觸及社會的每個階層。

與賽馬相比，賽狗於 1928 年引入上海後有一番不同的經歷。同樣源自英國的狩獵文化，同屬群眾性運動，但獵犬無法與中國傳統的「尚武」精神連結，從一開始就不被視爲「運動」，而是賭博。第五章討論賽狗這一運動如何一進入中國，即靠其強烈的賭博性質吸引華人，也招致一些華人團體指控，稱外人藉治外法權引誘華人賭博。與賽馬類似，賽狗引入上海時，其規章制度在英國和上海都處於草創階段。在上海，賽狗場於設計制度時，即意在吸引華人大眾，特意降低門票的價格與下注金額。同時，參考歐美慣例，爲方便民眾下班或下工後參賭，大量使用電力，將賽事安排在夜間。因此，賽狗不僅進一步降低了華人參與英式運動的門檻，使更多人得以參與其中，同時也透過電力、燈光以及跑狗時展現的瞬間爆發力與快感，展現一種舶來的現代性運動。

第六章討論另一種西式運動回力球賽。回力球賽源自西班牙，隨著殖民的腳步而傳入其他國家。這一運動與賭博兼具的賽事，在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出現固定的形式和規則，並逐漸商業化。1930 年，當回力球賽進入上海時，這個通商口岸已成爲亞洲最大的城市，商業、娛樂業皆甚爲發達，初具「夜上海」的格局。無論是對華人還是西人而言，回力球賽都是新事物。作爲「世上最快的球戲」，回力球賽娛樂性強，比賽多在夜間舉行，聲光炫目，提供強烈的感官刺激，引入不久即成爲滬上重要的代表場景。如果說賽馬和賽狗還會引發究竟是體育還是賭博的爭論，回力球賽甫一引進，即被認爲「是運動更是賭博」。中國傳統賭博分爲勝負立判的「武賭」與費心思的「文賭」，回力球賽以人作

爲勝負工具，華人認爲既然有人的因素，便有了鬥智的可能，於是援引中國傳統賭博方式中的「文賭」作爲下注策略，著名報人曹聚仁即爲這一賭法的鼓吹者。西方人在下注時往往以球員或球隊表現爲考量對象，而上海華人對回力球運動本身毫不在意，對球員的表現也無心了解，只關心球賽的輸贏。至此，回力球已不再是西式「群眾性運動」，而是一場與運動無關的中國式賭博。

本書將賽馬、賽狗與回力球賽並置，從組織者、運動參與者和觀眾等不同角度，考察來自西方的「群眾性運動」如何逐步被華人移轉爲中國式賭博，最後得出三項結論：第一，異國事物的轉譯不是簡單的本土化，經常因爲文化協商，朝不同的方向做出偏移；第二，它是一種多層次的變化，同一事物可以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移動；第三，它位移的方向以及幅度大小，取決於對手方文化力量的大小。

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在 1990 年代相繼崩潰後，西方學界出現了新的研究範式。有些學者指出，雖然毛澤東所領導的以農民爲主體的共產革命在 1949 年建立政權，但並沒有完全改變中國。他們相信，以上海爲代表的現代性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動力，共產革命只是暫時中斷了這一進程而已。職是之故，對中國近代開埠城市，尤其是上海的重新發現和再評價，成爲 1990 年代美國中國研究的熱點，並帶動了華人學界的相關研究。經營三十年後，上海研究不僅著作數量多，成名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張寧的著作則另闢蹊徑，關注英式運動進入上海後的移轉過程，是這一成果斐然的領域中頗具特色的著作。作者勤蒐近百年史料，並充分利用中研院近史所的資料庫，尤其是《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作者對英國歷史有一定的瞭解，故書中對英式運動的歷史背景也有詳細的交代，使讀者不僅可瞭解三種運動在母國的狀況，也因此獲得一種中西比較的視野。

近年來關於中西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史的研究，論題集中在所謂「翻譯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上，學者主要來自比較文學領域。他們認爲，西方的現代性之所以能全球化，翻譯起了很大的作用。非西方國家

所接受的現代性往往是一種翻譯的現代性，即「話語現代性」（discursive modernity）。同時，西方的「主語言」（host language）與非西方的「客語言」（guest language）之間也並非一一對應，有多種可能性，如何翻譯只是一種歷史性的選擇。研究文化轉譯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釋何以在某一歷史語境下，某種西方的現代性以某種語詞被翻譯引進。如“individualism,” “national character” 等詞，何以被翻譯而進入中文世界？爲何被翻譯成「個人主義」和「國民性」而不是其他？對這類並非中文古已有之，而是翻譯後才進入的詞彙，中國讀者如何理解？這些都只有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才能說明。這類研究還強調，非西方文明接受西方文明的態度並非只是被強迫，還有合作與協商。比如「國民性」這一充滿西方偏見的詞彙，經過翻譯進入日文和中文，被正在爲中國的危機尋找解釋的魯迅所接受，以此概念創作了《阿 Q 正傳》。從此，「國民性」被中國人接受，成爲自我批評的重要詞彙。[2]張寧研究的「文化轉譯」，不只是語言的轉譯，而是英式運動這一具體事物的轉化，涉及的面向更加複雜，這是與既有研究不同且頗有新意之處。

一般認爲「文化轉譯」屬於後現代理論，代表學者即被公認爲後殖民理論大家的霍米巴巴（Homi Bhabha）。該理論大概強調以下幾點：一、文化轉譯是一個過程，沒有作爲起點的文本，也沒有固定的目標文本，因此該理論強調過程（processes）而不是結果（products）；二、導致文化轉譯的首要原因是人的流動，而不是文本的移動；三、關注轉譯的文化影響；四、強調翻譯者是將不同文化連結起來的中間人（intermediary position），他們製造了文化混雜（cultural hybridity），又不斷突破不同文化間的邊界；五、突出文化轉譯時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認爲這是來自非西方文化的移民拒絕被居住國強勢文化完全整合的一種抵抗（resistance），一種對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堅持，

2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Lydia H.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也有助於走出非此即彼（binary）的簡單化論述。[3]張寧使用了「文化轉譯」這一概念，甚至作爲書名，但與學界一般的用法相比，對該概念的挪用也是「看似相同，實則有異」。比如，這一概念主要討論在後殖民語境下，非西方文化與西方強勢文化之間的關係。但張寧卻強調自己的研究「意圖走出後殖民的批判與民族主義的羈絆，改採旁觀第三者的態度」（頁 3）。既然語境完全不同，就需要對這一概念做出新的定義與解釋，或乾脆避用，採用張寧似不甚喜歡的「本土化」、「在地化」，否則難免引起誤會。既然採用了此概念，本書的結論亦不應只是歸納異國事物轉譯的特徵，似更應該以賽馬、賽狗和回力球賽三個個案，探討中國經驗如何豐富文化轉譯的理論及研究方法。

張寧的著作對於英式運動進入上海後發生移轉的過程有很細緻的考察，如馬匹的使用、比賽規則的修訂、賭法的改變、體育精神的世俗化、階級性的改造等方面，都有詳細的敘述。但作者對於移轉過程的解釋，則基本落在西方和中國的非此即彼（binary）之中：西式運動進入中土後所發生的任何移轉，都是因爲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所致。這一角度當然可以解釋一些現象，畢竟某一事物進入異國語境，在地化不可避免。然而，這種二元的解釋視角，亦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預先給轉譯過程設定了只能進行二選一的框架，從而忽視西方事物在中國口岸城市發生移轉時的歷史偶發性（contingency），也忽略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譯性」，限制了我們應有的歷史想像力。而「文化轉譯」這一概念的新意之一，恰恰就是要打破對於跨文化傳播現象進行二元對立的解釋，轉而強調其中的複雜性。

無疑，《異國事物的轉譯》是一本富有新意的文化史著作，啓發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提出更多的問題。在政治外交史的論述中，中國近代史通常被書寫爲一部血淚史，充斥著敗戰、國恥、苦難和傳統的失落。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通商口岸的歷史被簡化爲外人如何在租界成爲主人，「華人與狗不得

---

3 Anthony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nd edition), pp. 138-158.

入內」。痛苦、無力感固然是中國人面對堅船利砲，不得不接受現代性時的一種重要經驗，張寧卻透過英式運動在上海的移轉，爲我們提供了中國人面對現代性的一種另類經驗：並非義和拳式地抵制西方強勢文化，而是以合作的姿態參與其中，並對其改造，最終達至與西人平起平坐。同時，口岸城市的中國人以一種娛樂化的方式接受現代性，在其中尋找快感，再賭一把自己的運氣。